

# 吴湘案的“物议”、复推及其影响

陈 磊

〔摘要〕本文利用笔记、文集和墓志材料,将重点放在探讨吴湘案发生以后的舆论反应、如何理解党争和其时的朝局运作、牛李两党成员的分界、事件在晚唐以后的演变以及宋人如何看待这一案件及其间人物等方面。

〔关键词〕吴湘案;物议;党争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6—0038—07

〔作者简介〕陈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235

会昌末大中初的吴湘案是牛李党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宣宗大中初政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学界关于吴湘案有非常多的考证分析,其中有几点是共识。第一,吴湘案是宣宗和牛党打击李德裕及李党成员的借口。第二,吴湘案的最后结果是宣宗和牛党全胜,李党成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贬谪,李德裕更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老贬所。第三,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吴湘案的事实相对清晰,并无疑义,目前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对于这些事实的不同视角和诠释。而相应的,研究的重点也基本放在事件本身的考释。基于此,本文对于已有共识的内容不再涉及,而是利用笔记、文集和墓志材料,将重点放在探讨吴湘案发生以后的舆论反应、如何理解党争和其时的朝局运作、牛李两党成员的分界、事件在晚唐以后的演变以及宋人如何看待这一案件及其间人物等方面。

## 一 目前已有的研究以及吴湘案

为了后文讨论的方便,仅将吴湘案最基本的史料列出。武宗会昌四年(844)闰七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出为淮南节度使。会昌五年(845),发生吴湘案。《旧唐书》卷173《吴汝纳传》记载:

会汝纳弟(吴)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劬鞠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儿女送澧州。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覆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sup>①</sup>

之后李德裕“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争之,不纳”。<sup>②</sup>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四月,李德裕罢相,出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七月,

<sup>①</sup> 《旧唐书》卷17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00—4501页。《新唐书》卷181《李绅传》内容基本一致,不备录。

<sup>②</sup> 《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正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014页。

李绅卒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大中元年(847),吴汝纳诣阙为吴湘诉冤,宣宗下诏复查。二年(848)二月,御史台奏扬州都虞侯卢行立、刘群因为娶颜悦女一事与吴湘冲突,“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断湘处死”。<sup>①</sup>因此李绅追夺三任官诰,子孙不得入仕;涉案的李回、郑亚再度外贬,其余前淮南观察判官魏铦等多人被远贬、受杖、配流。李德裕因为之前已经罢相,并无处罚,但第二年九月,被再次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吴湘案的最终结果令李党尽数外贬,从某个程度上说结束了党争,因此研究大多集中在事件本身的考证和分析上,而且由于涉及史料相对集中,相关事实也没有太大的疑义,因此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这些事实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比较传统的观点。宋人以下大多接受了大中诏书的说法,认为吴湘案是冤狱,李绅和李德裕在此事上举措不当。王仲荦在《隋唐五代史》中沿用这一说法。

第二类观点认为吴湘案并无不当,吴湘坐赃是事实,大中覆狱完全是牛党打击李德裕的手段和借口。李德裕和李绅在处分上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但属于小节。岑仲勉在20世纪三十年代即撰文为李德裕、李绅辩诬,在《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序中指出,李德裕得罪的两大罪状为修改宪宗实录和吴湘之狱,而吴湘贪赃的事实并无疑问,不过李绅或者判刑失之于入,并且李绅是实际判案者,李德裕循制度行事而已。<sup>②</sup>王炎平则引《旧唐书》的李绅、吴汝纳两传,指出是覆核的崔元藻前后矛盾。吴湘贪赃的罪名不假,只是前后两次的量刑可能有出入,为宣宗及牛党利用来打击李德裕而已。<sup>③</sup>傅璇琮对吴湘一事做了很细致的分析,认为李德裕和李绅在会昌时期严惩贪赃的背景下,吴湘贪赃事实俱在,处分合乎法律程序,并无不当。只是存在小节上的不谨,比如没有细听反对意见,对崔元藻的处分过严,吴湘处死的过于仓促。<sup>④</sup>目前这种观点较为学界接受,2000年以后关于吴湘案的论文大多采用这一立场。

第三类基本接受了第二类认为吴湘罪赃当死的说法,但同时提出李绅和李德裕确实有不当之处,可能杂有个人恩怨和党派偏见,也为日后牛党的报复提供了借口。这一观点主要由李文才提出。<sup>⑤</sup>

在上述的观点中,岑仲勉曾提出吴湘坐赃确是事实,会昌中崔元藻重推称“盗程粮钱有实”,大中覆狱则说“虽有取受,罪不至死”,虽然前后有异,但正好说明坐赃这一事实不可改变。<sup>⑥</sup>这一论断是相当有力的。大中覆狱完全是要通过将吴湘案翻过来以打击李德裕,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承认吴湘坐赃,自然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吴湘坐赃确实自始至终都没有疑问,另一面,李绅断案从严、御史再推结论不一为李德裕压制以及杀不由时这三点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

## 二 吴湘案的“物议”、复推和党争

李绅断吴湘案是否过于严苛,由于目前缺少更加详细的资料,很难骤有定论,但是从当时的官员得知此事的反应来看,无疑是认为偏于严苛的。李绅本人性格刚直,断案从严的可能性极大。杀

① 《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第619页。

② 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6页。他在《唐史余沈》卷3“辨北梦琐言之李绅”中亦力辨王鸣盛采信《北梦琐言》及李绅“狂暴”之荒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6页。另外,在其所著《隋唐史》、《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等书中也有相关内容。

③ 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06页。

④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637-643页。

⑤ 李文才《关于吴湘案的几点考释》,《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⑥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4页。

不由时这一点事实俱在,不必讨论。因此本文仅就吴湘案引起朝廷官员的物议以及崔元藻的复推这两件事作些探讨,至于李绅的性格及此事对他的影响,本文第三部分会有具体论述。

有关朝廷物议及复推的记载如下:

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sup>①</sup>

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覆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sup>②</sup>

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崖州司户参军。<sup>③</sup>

(吴)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sup>④</sup>

吴湘案起,朝廷舆论大多先认为不公,原因是吴氏家族和李德裕家族向来不和,于是谏官请求覆核。吴李不睦这一点从无疑问,以往的研究也已经有了详尽的分析,本文就不再重复。从其时的物议来看,李绅很有可能断案从重,加上涉及到李德裕的私人恩怨,朝中官员在未必了解内情的情形下,倾向于相信案情有冤,并因而希望覆核。至此,淮南节度治下的一个贪赃案例开始和宰相扯上了关系。

李绅断吴湘案一是贪赃,一是娶部民女,有违格律。崔元藻覆核之后,提出前者确有其事,后者则不实。也就是说,和李绅的断案有差异。关于这一点各书的记载有微妙的不同。除旧书《李绅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明显有误。其余三书在娶部民女不实这一点上并无不同,而新书《李绅传》和《通鉴》说法一致,贪赃“有状(实)”。旧书《吴汝纳传》则说是“计赃准法”,肯定了李绅的判案。新传和《通鉴》的记载就有分寸得多了。

但是无论哪一种,这个结果都和原判有出入,按照唐律,既是死罪,应该重新再派人覆核。但李德裕因此对崔元藻大为不满,将之远贬,并且不再覆核,就依照李绅所判,处死了吴湘。严格来说,并不是吴湘案本身,而是物议和复推(包括对复推御史的处分),才将这件案子和李德裕绑在了一起。

事实上,在李德裕严厉处分了崔元藻之后,朝中仍有官员提出异议。“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柳)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惧”,<sup>⑤</sup>“御史平吴湘狱,得罪宰相。(敬)晦上疏极道非是,不少回纵”。<sup>⑥</sup>这里柳仲郢和敬晦的上疏都是针对崔元藻的得罪而发的。柳仲郢在唐代的官声很好,执法不阿,处理神策军刘潼殴打生母一事,可以看出其为人重礼守法,不畏强权。此时由他为崔元藻覆按得罪一事上疏,可见吴湘一案确有可议处。

而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大中初覆狱。即使朝廷上下都认为吴湘案李德裕有错,大中二年的处分同样也“失之于入”,但是当时“朝廷公卿无为辨者”,只有中书舍人崔嘏“作诏不肯巧傅以罪”,左

① 《旧唐书》卷173《李绅传》,第4500页。

② 《旧唐书》卷173《吴汝纳传》,第4501页。

③ 《新唐书》卷181《李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9页。

④ 《资治通鉴》卷248 会昌五年正月,第8014页。

⑤ 《旧唐书》卷165《柳仲郢传》,第4305页。

⑥ 《新唐书》卷177《敬晦传》,第5289页。

拾遗丁柔立“为上书直其冤,坐阿附,贬南阳尉”,<sup>①</sup>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除此以外,朝中再无其他“物议”。

宪宗以后,党争是其时朝局运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大中二年吴湘事后,李党贬逐殆尽,一般认为党争基本结束。这种将政治对手尽数外贬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当权者的愿望,但是否能够做到,并不单纯由党争或者党魁决定,想要除尽政敌和事实上做到完全是两件事。即以会昌末和大中初朝廷官员在与吴湘案有关的处置上作出的不同反应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不难看出,造成这种差别的最大的力量来自皇权。或者说,李德裕之所以在会昌时期拥有较大的权力以及李党在大中初尽数外贬,关键都在当时的皇帝身上。虽然一般都认为唐后期皇权受到诸多压制,但是就本文讨论的时段来看,武宗和宣宗的意志在其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将党争视为中枢朝局运作的表现之一,并且肯定皇权意志的重要作用,我认为这是理解中晚唐中枢朝局运作的关键之一。

而另一方面,党争双方的政见差异,甚至人员的变化并不象之前的研究所强调的那样,有判然的界线。传统观点认为如李商隐那样依违于两党之间,以致终身蹭蹬。其实即使从本文涉及的这一时期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如崔元藻是李回的门生,郑亚的下属,<sup>②</sup>由于覆核吴湘事遭致李德裕的不满而外贬,于是在大中覆按一事上转向牛党,事后也顺利升官。御史蔡京和令狐楚及其家族关系匪浅,<sup>③</sup>可是在大中覆按之后被贬,可见是站在白敏中等人对面,支持李绅断案的。

再如柳仲郢,曾在牛僧孺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为从事,很为牛僧孺赏识,说他至少偏向牛党应该不为过。会昌年间李德裕大力提拔他,“奏为京兆尹,谢曰:(柳仲郢)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sup>④</sup>李德裕罢相,柳仲郢也出为郑州刺史。但是大中年间牛党当政时他的仕途也并没有受到影响,唐人更没有将他视为依违两党的小人,《旧传》的评赞认为“柳氏礼法,公忠节概”。另外如李绅和牛僧孺之间也往来密切,<sup>⑤</sup>依违两党之间的,上述几人绝非个例。一般而言,牛李两党中人也并没有特别在意此事。

### 三 吴湘案的流传及影响

大中二年吴湘狱事之后,李德裕远贬,与之亲厚的官员受到牵连,李党自此流散,牛李党争也基本结束。但吴湘一案的流传及影响却并未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似乎注意不足,而相关问题确实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愿意做一些尝试,从唐宋人心目中的吴湘案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其事对李绅和李德裕的影响两个方面分别论述。

#### (一) 唐宋人心目中的吴湘案

今天的研究大多认为吴湘一事并非冤案,李绅或者失于过严,但吴湘入罪并无冤情。但是我们看唐人和宋人的记载,对于吴湘一事是冤案都相当肯定。<sup>⑥</sup>这些记载中或有错误,但是基本上反映出时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仍然值得讨论。以下从晚唐到北宋的相关的记载,依成书时间排序:

①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第5343-5344页。

② 李商隐《为荥阳公上马侍郎启》中说“崔监察是湖南李相公门生,是某所拜杂端日御史”。《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且崔监察元藻是湖南李相公首科门生,是某所荐御史。……昨蒙辨引,稍近加污。座主既不免于款中,杂端固无逃于笔下。”刘学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系于大中二年二月,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40、1745页。

③ 《云溪友议》卷中“买山讖”条云“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悞,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绚、纶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

④ 《旧唐书》卷165《柳仲郢传》,第4306页。

⑤ 丁鼎《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⑥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卢就就为李珣外甥,“入为侍御史,推吴湘冤事甚直,迁比部员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当然这里有偏向的问题。

1. 范摅《云谿友议》卷上“江都事”条云“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佐莫敢言之。……邑客黎人,惧罹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粃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踰境者也。”<sup>①</sup>

2. 《云谿友议》卷中“买山讖”条云“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绚、纶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公绅忧悸而死。颇得绣衣之称。(吴汝南诣阙申冤,蔡君先榜之曰‘是主上忧国之时,乃臣下无私之日。’)”

以上两条均出于《云谿友议》,该书作者范摅为晚唐僖宗乾符时人,第一条较长,未录的部分也基本是描述李绅独断的。第二条中的蔡京其实是支持李绅断吴湘狱的,因此在大中二年由殿中侍御史贬澧州司马。而且会昌六年(846)七月李绅已卒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大中元年才有覆狱事,时间上有问题。但既说李绅因为覆狱淮南而忧悸死,自然也就是认为吴湘案另有内情。

3. 《北梦琐言》卷1载“唐大中末,相国令狐楚罢相,其子湏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疏,述湏弄父权,势倾天下,……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阉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掩其小瑕,忘其大美。泊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

4. 《北梦琐言》卷6载“唐李绅,性刚直,在中书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恣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谓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误我也。’马植曾为卫公所忌,出为外任。吴湘之事鞠于宪台,扶风时为中宪,得行其志焉。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唯刘汉弘晓得七分,其他廉使乃三四而已。盖公之才已难得也。”

《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是五代后唐及北宋初人,第四条广为征引,这里吴湘案已经被解释成李绅出于私怨而对吴湘“恣无礼”的报复行为,自然是件冤案。第三条则可以视作是作者对吴湘案的概括,即李德裕“附会李绅而杀吴湘”确实是其“小瑕”。

5. 《太平广记》卷269《酷暴三·李绅》云“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绚、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歿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佐莫敢言。……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粃随流者不必报来。’”

此条《广记》注明出自《云谿友议》,但不见于今本,从内容上看,更象是对卷上“江都事”的改写,又增添了吴湘一事的前后经过,明言“无辜盛夏被杀”,则《广记》的编纂者显然将吴湘狱事视为冤案。另外又增加了关于李绅的评价,这一点下文另有论述,此处不赘。

6. 《南部新书》丁载“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

<sup>①</sup> 第一条后为《唐语林》卷4《豪爽》袭用,作者王说为宰相吕大防之婿,大致年代在宋仁宗时。因为内容几乎全同,即不再录。此节所引《去奚支议》、《北梦琐言》、《太平广记》、《南部新书》均为四库本。

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后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冽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大惭而止。终以吴湘狱,仰药而死。”

《南部新书》作者钱易为钱塘钱镠后人,宋真宗咸平中进士,则成书在《广记》之后。此条有关吴湘的内容很少,可能袭自《云谿友议》蔡京事,因此时间上也有问题。而将此事放在列举李绅为政苛急之后,作者对于吴湘事的态度就很明显了。

7.《册府元龟》卷699《牧守部·枉滥》云:“李绅,文宗开成中镇维扬。有颜氏女殊色,为游客吴湘所聘(吴湘即江都县尉也。与绅争婚颜氏。绅怒其无礼,拾赃罪奏而杀之,非游客也。)绅屡求之,意欲遗李德裕。为湘所拒,乃诬以他罪害之,颜氏寻亦自裁。”

《册府元龟》的成书时间比《南部新书》更晚,内容也相当荒谬,错误又多,不必具体辩证,但作者对吴湘一事的看法是很清楚的。

以上所引7条,内容真伪互见,但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吴湘案是冤案。晚唐时主要认为冤在李绅判得过于严苛,五代以后,开始为这一事件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大中诏书并未否定吴湘坐赃的事实,到北宋初期,吴湘则成为“无辜盛夏被杀”的受害者。随着吴湘案越来越生动,越来越肯定地被当作冤案,李绅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 (二) 吴湘案对李绅和李德裕的影响

李绅在文宗、武宗两朝历任滁州、寿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河南尹、宣武节度使、淮南节度使,他在当时的政绩和名声,可以引白居易为李绅家庙作碑铭时提到:

大凡公之为政也,应用无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为先,……廉察浙右,以分忧为功,……尹正河洛,以革弊为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难理,乃授铁钺,俾镇绥之。初宣武师人,骄强强悍,扭乱徼利,积习生常。公既下车,尽知情伪,刑赏信惠,合以为用,一年而下怨劝,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肃然丕变,薰然太和。抚之五年,人俗归厚,至於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洪水,致岁於丰稔,免人於垫溺。……制加银青光禄大夫扬州长史淮南诸道节度观察等使,余如故。诏下之日,……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箠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於时开成、会昌之际,上方致理,公未登庸,熙熙苍生,环望而已。<sup>①</sup>

即使白居易有所夸大,但是说李绅在历任外官上政绩斐然,为人爱戴钦服应不为过。新传也说“迁滁、寿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开成初,郑覃以绅为河南尹。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sup>②</sup>可见李绅的廉能之名。上文所引晚唐范摅的《云谿友议》也肯定李绅在宣武节度和淮南节度任上镇地方功绩。五代《北梦琐言》则明白指出“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盖公之才已难得也”。可以说唐人对李绅治理地方的才能是完全肯定的。

而在吴湘案覆狱发生之后,李绅则渐渐被目为“酷暴”。有趣的是,入宋以后,李绅酷暴的名声流传更广。以上文所引7条记载为例,晚唐的《云谿友议》只是觉得他用法过严,做事比较独断而已,“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到五代及宋初,已经将断吴湘案视作李绅出于私怨“惩无礼”的表现。到宋太宗时的《太平广记》,列于“酷暴”目下,这段引文不见于今本《云谿友议》,而改写的部分增加的几乎全是对李绅负面的评价。引文直接说李绅是“恣威权”,而在“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一段之后,省略了《云》原文中的“自此一言,竟无踰境者也。”因而很明显地,其中李绅的形象也就有了改变。这里增加的对于李绅的评价更直接为新传所引用。至于真宗以后的两条记

①《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白居易集》卷7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90页。

②《新唐书》卷181《李绅传》,第5349页。

载,离真相越来越远,而李绅酷吏的形象也越来越明晰。对比新旧唐书《李绅传》的评论:

绅始以文艺节操进用,受顾禁中。后为朋党所挤,滨于祸患。赖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终。  
(《旧唐书》卷173《李绅传》)

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报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新唐书》卷181《李绅传》)

新传多加的这句话就袭自上引《太平广记》。这完全可以视为晚唐到北宋期间对于李绅评价的变化。如果说这一改变主要是由吴湘案的覆狱以及当时人对吴湘案的评判而引起的,应当不算过分。

而对于李德裕来说,吴湘覆狱增添了一项党同庇护李绅错判的罪名。在大中复查的结论出来之前李德裕已经罢相,但一年多以后的大中三年九月,制书再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

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谄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专权生事,妒贤害忠。……诬贞良造朋党之名;……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又附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sup>①</sup>

官方认定的罪名一是得君专权,一是妒害贤能,而提到的具体罪行则是修改宪宗实录和纵容李绅冤断吴湘事。之后,这两点基本成为李德裕的定论,大中三年牛僧孺下葬,杜牧作墓志铭,有“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sup>②</sup>李珣的神道碑论及会昌时,“行险者乘时而起,凶德参会,倒置天下事,清贤各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难摇撼”。<sup>③</sup>和官方制书的口径如出一辙。

直到咸通二年(861)十月,白敏中墓志中提到敏中在会昌中“充承旨中书舍人,户部、兵部侍郎。时权臣有乘时得君谓天下可以喜怒制而人皆可以销死泥下者。公横身守正,有不合理,即予呵叱,由是朝廷仪物,多士修整”。<sup>④</sup>五代末期,“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难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谗遗阍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掩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sup>⑤</sup>时过境迁之后,在李德裕是否专权、排除异己的问题上评价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吴湘一案始终成为李德裕的一个弱点。

(责任编辑:王 健)

① 《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制,第625页。

② 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樊川文集》卷7,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李珣《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888,第4679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④ 《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致仕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尉白公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05,第10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北梦琐言》卷1。

### **On the Criticism of Wu Xiang Case and Its Influence**

**CHEN Lei**

Based on notes , collected works and epitaphs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ftermath of Wu Xiang Case , including the public opinion , fights of Niu Dang nad Li Dang , evolution of the case after late Tang dynasty and how people in Song dynasty looked at it.

### **On the Manichaeian Cosmogony of Microcosm: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Some Texts**

**RUI Chuan-ming**

Though the Manichaeian Cosmogony adopts some cultural factors of ancient Greek , Iran and India , etc. , it forms its own features , especially the theory about the creation of human , animal and plant is more different from other cultures. Here certain related texts are selected to be translated , commented and studied , and a brief conclusion of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s given also.

### **On the Traces of Tigers in Shanghai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As Recorded in Local Chronicles**

**ZHANG Jian-guang**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accounts on the traces of tigers in Shanghai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igers were found in most regions of Shanghai from late Yuan dynasty to early Qing dynasty. Tigers were found in those areas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were fit for their living. However ,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the tigers' habitats became increasingly smaller in size and their living space was invaded due to people's reclamation of land. Therefore the tigers frequently attacked people. After 1761 , tigers no longer appeared in Shanghai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 **Worshipping Buddha and Borrowing Money: A Study of Local Community for Worshipping the Dipankara Buddha in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Yi**

This essay researches the local community for worshipping the Dipankara Buddha in Shicang area in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new discovered local archives Dingguang Gufo Shoudan Huibu ,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munity was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with annually worshipping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thirteen members.

### **Studying the 1861 Sino – P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 from German Literature**

**WANG Wei-jiang**

The first official contact of modern China and Prussia was the signing of the 1861 Sino – P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 Chinese Literature didn't record much about this event ,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were therefore rarely seen. However , German literature has detailed recordings of the whole process. Based on German literature , this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the treaty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psychology of officials of Zongli Yamen in dealing with Prussians and their knowledge of foreign countries.

### **Doing Textual Research on Jing – lin Publishing House**

**LI Zhi-ming**

Jing – lin Publishing House was one of the most well – known and influential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Many researchers make researches on it , but opinions were widely divided , and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